

宋常立 / 著

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论

大视野文艺研究丛书·古典文学卷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论

宋常立 著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论/宋常立著. —天津: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00.4

(“大视野”文艺研究丛书/张春生,门岗主编)

ISBN 7-80563-796-2

I. 中… II. 宋… III. 小说-文学研究-中国-古代
IV. I207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1984 号

出版发行: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出 版 人:荣长海

地 址: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

邮 编:300191

电 话:(022)23668122

电子信箱:TSSAP@Public.tpt.tj.cn

印 刷:天津市武清开发区腾龙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8

字 数:200 千字

版 次: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 ~ 1000 册

全套定价:420.00 元 **本册定价:**1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大视野丛书·文学评论卷

顾问:房良钧

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编委会成员:何宝庆 | 王昌定 | 滕云 |
| 宁宗一 | 汤吉夫 | 夏康达 |
| 张春生 | 门 焜 | |
| 执行主编:张春生 | 门 焜 | |
| 编校人员:邢广域 | 孙玉蓉 | 郭武群 |
| 陈慧娟 | 张宜雷 | 鲍震培 |

内容提要

本书从文体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小说作了新的分类研究,考察了从文言小说到白话小说、从先秦古小说到近代小说在文体上的嬗变,对各类文体小说均结合具体作品,细致地阐明了其文体形式的产生、基本特征及演变轨迹。论述中,或结合叙述学理论、或与古代小说的姊妹艺术古典戏曲相比较,对古代小说文体的民族形式做了综合性考察。全书对构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学的新体系,进行了有益的探索。

导言：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界定

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形态有其特有的民族特征。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发展看，它们既有“丛残小语”式的笔记体小说，又有“文备众体”的传奇体小说，更有长达几十万字的章回体小说，其文体形态相去甚远；即使是同一时期的小说，往往又有多种不同的体制，如宋元话本，除一般的以散体叙述为主的话本小说外，还可以有赋体小说、诗话体小说、词曲体小说等多种。那么，怎样确定这一研究对象的范畴，也就是说，应该把哪些作品划入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范围之内，这就需要一个标准。做为今人，自然是要立足于今人的小说观念，去研判历史上的众多文本哪些属于小说。应该说，无论是雏形期小说，还是成熟期小说，也不论它们的体制形式有多大不同，我们的研究对象，都应该或多或少地符合现代小说观念。比如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小说家”之下列书十五种，其中很多都是以说理为主的作品，明代胡应麟在给“小说”分类时，将“丛谈”“辨订”“箴规”之类非叙事作品也划入小说，在今天看来，这些都应该在小说文体研究的剔除之列。所谓现代小说观念，如果列举各种说法，恐怕也是五花八门，法国批评家阿比尔·谢括利给小说下的定义是肯切而简明的：“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。”^①用散文虚构故事，古今中外任何小说都逃不脱这个特征。这个简明的定义为我们确认中国古代小说作品，提供

^① 转引自爱·摩·福斯特《小说面面观》。

2 导言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界定

了一把现代的解剖刀。

中国古代小说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。用“散文虚构故事”这一定义去衡量文言小说,可以使文言小说与同样含有虚构故事成分的韵文作品相区别,如叙事诗《孔雀东南飞》、《长恨歌》等就不是小说,这是显而易见的。另外,这一定义,也使文言小说与史传相区别。史传作品,特别是那些历史人物传记,也是用文言散文写成,也有一定的故事性,但史传作品讲求实录,排斥虚构,所以也不能算是小说。再者,根据这一定义,我们既可以把古人认定小说的,如上举班固、胡应麟所列的那些非故事性的说理、考订、家训之类的作品,剔除出去,也可以把古人并不认为是小说的,划入我们的研究范围,如被历代目录学家列入史部的《吴越春秋》,记述吴越两国的史事,多采传闻异说,虚实兼备,颇具小说色彩,可以看作是早期的历史演义小说。用这一定义去鉴别那些今人已经取得共识的某些古代小说作品集,可以看到,其中的作品也不全是小说,如志怪小说集《搜神记》里,那些有关妖祥卜梦之事的记载,有关山、泉、井、穴等自然事物性状的说明,简短破碎,有的甚至短至几个字或十几个字,毫无故事性可言,并不能算作小说,真正可称为志怪小说的作品,在《搜神记》中也就占一少半。《聊斋志异》恐怕没有人能怀疑它是一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,但其中的《水灾》、《地震》、《狮子》、《蛤》等篇,只是某些自然现象和自然物的实录,也不能算作小说。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传统小说观念将小说看作史传的附庸,以至往往使史的实录性文字与虚构的小说文字混淆不分。

用“散文虚构故事”这一定义去衡量中国古代白话小说,可以将白话小说与说唱文学相区别。唐代的变文以及后来的宝卷、弹词等,也用白话虚构故事,但它们以韵文的诵唱为主,就不能算作小说。不过,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源自唐代俗讲,是从说唱文学脱胎而来,因此,它明显地带有它的母体特征:以散文叙述为主,却又融

进了诗、词、曲赋等多种韵文形式。韵散相间,甚至穿插少量唱曲,这就成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区别于西方小说的显著特征。这样,完全强调“散文叙述”,似乎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略显不足,尽管如此,用这一定义去区分古代白话小说与说唱文学还是十分有用的。

如果说,某些文言小说容易和史传作品相混淆,那么,某些古代白话小说则与说唱作品难区分。如《刎颈鸳鸯会》,其中穿插了十首[商调·醋葫芦]曲,说唱结合,但它仍然是以散文叙述为主,并且有着话本小说基本的体制特征,明人《清平山堂话本》就将其视为小说,我们自然也不能将其排之于小说之外。当然,在鉴别白话小说与说唱作品的时候,除了要注意韵散的数量比例,还应注意韵文的功能,如话本《快嘴李翠莲记》、《张子房慕道记》,尽管韵文数量很多,却与说唱文学中韵文的功能不同,我们就将其归之于诗话体小说,而不看作是说唱文学。

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由于受韵文和说唱文学的影响很大,所以还出现了一些特例,如唐代的《燕子赋》、《晏子赋》、《孔子项托相问书》、宋元话本《钱塘梦》、清代小说《燕山外史》、以及晚清小说《玉梨魂》等,均用赋体文字写小说,形成中国古代特有的赋体小说系列,对于这些小说,我们就不能轻易用现代小说定义去扼杀它,而应从作品实际,去发掘它在文体上的民族特征。总之,我们要用现代小说观念,尽可能全面地包容诸种传统小说文体,以展示出它们的民族风采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导言: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界定 | (1) |
| 第一章 文言小说的起源 | (1) |
| 第一节 传说——古小说的起源与分类 | (1) |
| 第二节 历史传说与史传形式结合——杂史小说的形成与分类 | (3) |
| 第三节 异闻传说与人物品评的实录——笔记小说的形成与分类 | (7) |
| 第二章 杂史小说的文体特征 | (12) |
| 第一节 传奇体的《燕丹子》 | (12) |
| 第二节 演义体的《吴越春秋》 | (16) |
| 第三章 笔记小说的文体特征 | (21) |
| 第一节 杂记体小说的文体演进 | (21) |
| 第二节 世说体小说的文体特征 | (30) |
| 第四章 唐人传奇小说的文体特征 | (36) |
| 第一节 “征异话奇”——唐人小说创作自觉意识的产生 | (36) |
| 第二节 传奇小说对史传叙事法的继承与发展 | (40) |
| 第三节 传奇小说的诗化 | (46) |
| 第五章 话本体制溯源 | (51) |
| 第一节 话本伎艺特征的形成原因——说话伎艺的市场化与群体化 | (51) |
| 第二节 唐代俗讲转变为说话伎艺孕育了接受群体与表 | |

2 目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演市场 | (56) |
| 第三节 唐代俗讲转变为说话伎艺提供了基本体制 | (60) |
| 第四节 唐代话本文体的独立 | (64) |
| 第六章 话本人话的形式、作用及演变 | (73) |
| 第一节 入话的三种形式 | (73) |
| 第二节 入话的作用 | (79) |
| 第三节 入话的发展演变 | (87) |
| 第七章 话本正话的类别与发展 | (92) |
| 第一节 赋体小说 | (92) |
| 第二节 诗话体小说 | (102) |
| 第三节 词曲体小说 | (107) |
| 第四节 散体小说 | (113) |
| 第八章 宋元讲史平话与章回小说 | (121) |
| 第一节 讲史平话的标目与章回小说回目的定型、发展 | (121) |
| 第二节 讲史平话的两种成书方式及对章回小说成书方式的影响 | (129) |
| 第九章 《三国志演义》的成书方式与文体特征 | (138) |
| 第一节 《三国志演义》的成书方式——“据正史、采小说” | (138) |
| 第二节 《三国志演义》的文体对人物表现方法的制约 | (144) |
| 第三节 智谋故事叙事模式及其深层结构 | (156) |
| 第十章 《水浒传》的成书方式与文体特征 | (167) |
| 第一节 《水浒传》的成书方式——集撰“讲史”、“小说” | (167) |
| 第二节 《水浒传》的版本与文体的演变 | (172) |
| 第十一章 《金瓶梅》文体的承前启后 | (182) |
| 第一节 《金瓶梅》对传统叙事文体的广泛借鉴 | (182) |
| 第二节 《金瓶梅》小说文体的戏剧化 | (190) |
| 第十二章 《红楼梦》文体的创新 | (200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节 符号性叙述与描写 | (200) |
| 第二节 叙述分层 | (209) |
| 附录: | (218) |
| 一、理想与现实之间 | |
| ——谈《三国志演义》里刘备形象的创造 | (218) |
| 二、《三国志演义》版本演变的社会文化意义考述 | (229) |
| 主要参考书目 | (239) |
| 后 记 | (240) |

第一章 文言小说的起源

第一节 传说——古小说的起源与分类

小说史的研究者一论到中国小说的起源,大多从神话传说、史传文学、诸子散文等对小说文体的影响与孕育谈起,说某篇小说更多神话,某篇小说更近史传,某篇小说更似子书等等,似乎中国小说的起源是多祖、多源的,每个源头都可以独立地孕育出小说,这种说法看似全面,实则让人感到渊源不清。

既然古人的小说观常常将小说与史传甚至说理议论性的文字相混淆,那么,今人研究古代小说的起源,实际上是在认定某些文本可以算是小说作品的前提下,探讨这些小说作品的渊源。我们认定的古代小说作品,与史传或议论性文字的最大区别就是“虚构”,然而,问题是,一般认为唐以前的古小说,作家并无自觉的虚构意识,那么,古小说中的“虚构”成份不是来自作家的自觉意识又是来自哪?答案只有一个,即来自传说。

一般意义上的传说与神话一样,属于人类早期文化形式之一,因而在某些场合,二者常常相互联结使用,人称“神话传说”。但严格说来,传说与神话是有区别的,其主要区别在于:“传说”所叙述的事件已不是发生在开天辟地的远古时代,而是发生在这个时代以后的一段时期。这意味着“传说”的内容较之神话更接近人世,是人类历史的一种早期形式。

2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论

说到中国小说的起源,人们常征引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诸子略·小说家”小序中的一段话:

小说家者流,盖出于稗官。街谈巷语,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。

所谓“街谈巷语”、“道听途说”实际就是“传说”。其实早在西周就有采集传说献纳于君的类似“稗官”的职官。西周文化是一种史官文化,周人重史,举凡政府的誓、命、训、诰,历史事件、人物言论,都要由史官记载下来,作为历史文献藏之官府。但是,除了这些信而有征的史实外,周人也十分重视作为人类历史早期形式的“传说”,在周官系统中就可以找到与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说的负责收集“街谈巷语”献纳于君的稗官相对应的职官^①,这就是《周礼》中“地官”的“土训”、“诵训”和“夏官”的“训方氏”:

《周礼·地官·土训》曰:“土训掌道地图,以诏地事。道地慝,以辨地物而原其生,以诏地求。王训守,则夹王车。”

《周礼·地官·诵训》曰:“诵训掌道方志,以诏观事。掌道方慝,以诏辟忌,以知地俗。王巡守,则夹王车。”

《周礼·夏官·训方氏》曰:“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,诵四方之传道。”

这里的“道”,注云“道,说也”、“道犹言也,为王说之”,可见此三官的主要职能是“为王说之”,与稗官献纳于君以广视听的职责是相同的。至于说的内容:关于土训“道地图,以诏地事”,注云:“说地图,九州形势山川所宜,告王以施其事也。”“道地慝,以辨地物”,郑

^① 参见潘建国《“稗官”说》,载《文学评论》1999年第2期。

司农云：“地慝，地所生恶物害人者，若虺蝮之属”；关于诵训“道方志，以诏地事”，注云：“说四方所道久远之事，以告王观博古”，“掌道方慝，以诏辟忌，以知地俗”，注云：“方慝，四方言语所恶也。不辟其忌，则其方以为苟于言语也。知地俗，博事也”；关于训方氏“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，诵四方之传道”，注云：“传道，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也。为王诵之，若今论圣德尧舜之道矣”，疏云：“谓上古以来，传闻言说之事”。

这里所说的“地慝”、“方慝”、“四方所道久远之事”、“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”、“上古以来传闻言说之事”等等，正是属于传说的内容，属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言“街谈巷语”、“道听途说”者鄙野俚俗、不登大雅之言。其中，“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”、“上古以来传闻言说之事”属于历史故事传说，那些内容丰富、情节完整的传说故事，用史传的形式记载下来，就形成了后来篇幅漫长的“杂史小说”，如《穆天子传》、《燕丹子》等。而那些“道地慝”、“辨地物”、“知地俗”之类的传说，属于地理博物类传说，这类传说，大都是只言片语式的，录之笔端，就形成了后来篇幅短小的笔记小说。这样看来，根据传说的两类形式，早期的文言小说从文体上实际上就可以划分为篇幅较长的“杂史小说”和篇幅较短的“笔记小说”两大类，篇幅的长短是由其内容决定的，这两类小说是同时产生，不分先后的。那种认为中国小说文体的产生、发展是由简到繁、由短到长的看法是不确切的。

第二节 历史传说与史传形式结合——杂史小说的形成与分类

人类的早期历史，由于缺乏文字的详细记载，大都是一些历史传说，后来的历史学家要记载这段历史，就不能完全绕开这些历史传说。由于传说本身无一定形态可言，所以不同的文字形式可以赋予它不同的形态。如果以韵文记诵，则赋予它诗的形态，成为史

4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论

诗；如果以散文记述，则赋予它史的形态，成为史传。据闻一多《歌与诗》，记事是诗的最初本质，在《周礼·春官》的记载中，瞽矇的主要职责是“讽诵诗，世奠系，鼓琴瑟”，司掌以韵文记诵历史。如《诗经·大雅》中的《生民》为祭神性祖先后稷之歌，《公刘》为祭英雄祖先公刘之歌，《生民》、《公刘》可以说是汉族先民的史诗。而在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中，同样记述了后稷、公刘的事迹。同一传说，前者使用形式化的富于音乐节奏的语言，内容更多细节的想象，因而成为具有审美意义的史诗，后者用散文记述，略去细节以求信实，成为史传。

史传排斥虚构，所以史家常常略去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细节、情节，只取其梗概，以免虚妄，结果有的传说在正史中就显得音影模糊，语焉不详了。如有关周穆王的史料见于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，其中关于穆王北绝流沙，西登昆仑，西行见西王母等许多带有传奇色彩的事迹，就没有涉及，只是在《史记·赵世家》中十分简略地提及穆王“西巡狩，见西王母，乐之忘归。”《秦本纪》以同样简略的文字记为，造父为周穆王驾车，“西巡狩，乐而忘归”。而实际上周穆王巡行事，有着大量有声有色，富于传奇色彩的情节，既然史家不取，则只能交由那些杂史作家去记载了。出土于西晋初年汲冢大约作于战国中期的《穆天子传》，就把穆王当作传奇英雄，将其传说中的巡行之事，详尽生动地描述出来。按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云，书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，今本则六千六百二十二字，其中大半内容属传说虚构性质，这使它与史传有了本质区别，如“周穆王见西王母”一段就极具小说味道：

吉日甲子，天子宾于西王母，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，好献锦组百纯，组三百纯，西王母再拜受之。

乙丑，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。西王母为天子谣曰：“白云在天，山陵自出。道里悠远，山川间之，将子无死，尚能

复来。”天子答之曰：“予归东土，和治诸夏，万民平均，吾顾见汝。比及三年，将复而野。”西王母又为天下吟曰：“徂彼西土，爰居其野。虎豹为群，於鹄与处。嘉命不迁，我惟帝女。彼何世民，又将去予。吹笙鼓簧，中心翔翔。世民之子，唯天之望。”

天子遂驱升于弇山，乃纪名迹于弇山之石，而树之槐，眉曰西王母之山。

这段描写韵散交错，记述了周穆王来西王母处作客，二人以诗歌唱和，西王母在诗中表达了对周穆王的深厚情谊，祝愿他长寿，希望他再来。而周穆王在诗中则表示待回去治理好周王室疆域，使万民过上平和的生活，不出三年，再来相会。这些内容表达了人民的美好愿望。文中的“谣”，是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，带有民歌风味，可能是民间创作，对歌形式亦来自民间，所以明代胡应麟说它“颇为小说滥觞”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把它列在起居注类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把它列入实录类，显然是着眼于它记事有月日的史传体例，而《四库全书》将其列入小说家类，则是着眼于它大半虚构“恍惚无征”的传说内容。这样，以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作为父体基因，以载之竹帛的史传形式作为母体胚胎，二者的结合，便孕育出中国古代最早的杂史小说。

杂史小说的大量出现是在汉代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录了它兴盛的情形：

汉初，得《战国策》，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。其后陆贾作《楚汉春秋》，以述诛锄秦、项之事。又有《越绝》，相承以为子贡所作。后汉赵晔，又为《吴越春秋》。其属辞比事，皆不与《春秋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相似，盖率而尔作，非史策之正也。灵、献之世，天下大乱，史官失其常守。博达之士，愍其废绝，

6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论

各记闻见，以备遗亡。是后群才景慕，作者甚众。又自后汉已来，学者多钞撮旧史，自为一书，或起自人皇，或断之近代，亦各其志，而体制不经。又有委巷之说，迂怪妄诞，真虚莫测。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，通人君子，必博采广览，以酌其要，故备而存之，谓之杂史。

这里说到的“杂史”，其主要文体特征是“体制不经”，突破了正史体制，将一些“迂怪妄诞，真虚莫测”的“委巷之说”杂入史学叙事体之中，从而创造了杂史小说的叙事体制。

属于杂史小说的典型作品是《燕丹子》和《吴越春秋》，前者记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的传奇故事，类似后世的传奇小说，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杂史小说中的传奇体小说代表作，后者记吴越兴亡的历史故事，类似后世的历史演义小说，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杂史小说中的演义体小说的代表作，对于它们各自的文体特征后面将另作论述。

汉代还兴起一类有关神仙方术的杂传体作品，这与汉武帝喜好方术有关。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、《史记·封禅书》、《后汉书·方术传》皆云武帝好方术，为求见仙人，武帝数次东巡海上，时“齐人之上疏言神奇方者以万数”，武帝“与方士传车及闲使求仙人以千数”^①。由此，汉代出现了《汉武故事》、《汉武内传》、《列仙传》等作品。《汉武故事》将历史与幻想杂糅，正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指出的“所言亦多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相出入，而杂以妖妄之语”。《汉武故事》记述汉武帝一生的琐闻轶事，所记故事，一事一段，不连续，但都围绕武帝这个中心人物和他求仙这个中心事件组织材料，这种以一个人物为中心的写法，显然受史传影响还较大，可以将它们称之为杂传体小说。《汉武内传》在《隋志》中归入杂传类，它写汉

^① 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。